

既是科普也非關科普： 公共書寫與社會參與

黃長玲*

臺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公共書寫，就學術社群而言，可能起源自「芭樂人類學」，隨後「巷子口社會學」、「地圖會說話」、「故事」、「歷史學柑仔店」、「菜市場政治學」、「白經濟」、「法律白話文運動」……等等的出現，使得各學科或是專業領域都有相當數量的學者投身公共書寫。公共書寫當然也不限於這些以共筆部落格、網站、或是臉書粉絲頁為發表平台的作品，許多貼近社會大眾的學術著作也在公共書寫的範圍內。所有這些公共書寫，都如本次專題所示，有著「轉譯」的意義，盡可能以一般讀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分享專業領域的研究成果或是重要概念，也因此「科普」就成為公共書寫的核心意涵。以高等教育或是學術研究跟一般社會大眾的距離而言，科普作品也代表了知識社群善盡公共責任的重要形式。

就我個人公共書寫的經驗而言，科普研究成果並非主要動機，倡議性別平等和轉型正義才是，雖然兩者並不互斥。「菜市場政治學」成立迄今，我只有貢獻一篇作品，而那篇作品還並非我自己執筆，是由編輯群中的顏維婷教授以淺近的文字說明了我一篇關於臺灣婦女保障名額的論文的研究內容。然而，過去二十年間，我寫過相當多的評論，內容幾乎都跟性別平等和轉型正義有關。許多評論不只代表個人立場，也反映我所參與的組織立場。投身公共書寫的很多學界同仁並不見得參與社會組織，但是有參與社會組織經驗的同仁，大約都有類似的經驗，許多時候我們的公共書寫與時事密切相關，書寫的目的往往是藉由評論時事，彰顯我們所關切和倡議的價值。這些公共書寫既涉及科普，也非關科普，雖然他們與知識累積有關，但是主要目的不是在科普研究成果。

以評論為主的公共書寫涉及科普是因為許多評論要呈現一個議題的重要概念、背景或是歷史及政治脈絡。這樣的書寫，沒有研究者或是社會組織對議題的長期追蹤，是不可能完成的。對議題的長期追蹤，是進行社會說服時最有效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的方式之一，因為對於時事，許多人可能因為不同的立場和觀點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呈現一個議題的長期趨勢或是前因後果，相較於個人一時一地的感受，比較能創造對話空間。舉例而言，無論是我自己的研究，或是我所參與的婦女組織（婦女新知基金會），都長期關注女性在政治上的代表性，也因此內閣或是其他由總統提名的職位（如大法官、考試委員和監察委員）中的女性比例，無論是個人或是組織，每次評論，大約都會呈現長期資料和國際趨勢。然而，評論有時也非關科普，是透過指認重要的現象，進行社會溝通和倡議。這種情形在個人經驗中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我評論過不止一次的，普遍在臺灣社會存在的女體行銷現象。正因為它在臺灣社會普遍存在，也因此評論時多半是針對政府或是政黨作為，避免以民間的商業行為，如各種商業展覽或是宮廟活動作為焦點。避免針對民間商業行為是因為理解社會的性別平權價值需要長期的溝通成長，但是批評政府或是政黨，則是課以有權力者實踐性別平權的責任。這些評論並沒有研究成果作為基礎，而是對社會的長期觀察，但是評論中呈現的觀點，則和我多年來進行性別研究和教學有關，也因此它仍然跟知識累積有關。換言之，這些評論在某個意義上科普了性別研究這個領域的觀點，而不是我個人的研究成果。

對於當代臺灣學術界而言，公共書寫的主要挑戰，可能是來自於學術體制。雖然中研院出版「研之有物」，是體制性的科普作品，但是目前的學術體制其實並不鼓勵公共書寫。除了公共書寫與聘任升等及各種獎勵無關以外，各大學對於向社會大眾介紹校內教授的研究成果，也並不真正投入資源。以美國為例，眾所周知美國高等教育較為市場化，也許正因為市場化，而校友是主要捐款者，所以許多學校的校友刊物都是很好的學術科普刊物。臺灣各大學雖然都有校友刊物，有許多也邀請校內教師分享研究成果，但是由於仍然依賴教授供稿，而不同的撰稿者科普自己研究成果的文字能力不同，因此呈現出來的公共書寫效果也差別很大。簡言之，專業作者對於學者成果的說明，往往可能比學者自己撰稿的效果要好，這就像《華爾街日報》或是《經濟學人》對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說明，很可能比得獎學者本身的說明來得淺顯易懂。事實上，公共書寫在美國逐漸成為專業技能，而不只是學者在面向公眾的平台或是媒介書寫可以簡單概括。對於文字流暢和概念清晰的要求，逐漸成為這個專業技能的基本特性，但是這點在臺灣的個別學者之間常有著明顯差異。

在網路和社群媒體崛起之後，公共書寫中的「公共」與「書寫」顯然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兩者都更為多元也更為複雜。一方面，網路和社群媒體確實使溝通變得更為民主，但是另一方面演算法導致的同溫層現象，可能使得公共性

被限縮，而書寫形式也似乎不再以文字為主，逐漸被圖像和影音取代。在公共書寫以不斷變化的新面貌出現時，本來對學者而言不存在的誘惑或是困擾，也跟著出現，譬如點閱率或是按讚數。我們很難對點閱率或是按讚數賦予清楚的意義，因為我們很難確認較高的點閱率或是按讚數究竟對於公共性而言是什麼意義，在不同的政治和社會脈絡中，高點閱率或是按讚數可以代表全然不同的意義，也只有在具體的脈絡中，讀者和作者才能有效思考他們的意義。公共書寫在順應公眾興趣與導引公眾興趣之間的拉扯，是所有書寫者都面臨的難題。很多時候，兩者之間的取舍或是平衡點考驗的不僅是書寫者的能力，也包括對書寫內容的真誠。較為聳動的題目有可能吸引公眾的注意力，但是也可能強化某些用字或是視角的偏見。

也許對所有的書寫者而言，最值得思考和謹記的是我們的書寫所具備的權力意涵是什麼？是在不知不覺中讓有權力的人更有權力，還是能夠讓沒有權力的人的處境更被理解？書寫的權力意涵，其實也就是參與的權力意涵。我們是為了對抗權力持有者的權力而寫，還是為了捍衛他們的權力而寫？這是值得每個書寫者深思的問題。另一方面，多年來人文社會科學在知識上自我殖民的問題，是學界許多同仁關心和反省的主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個人的觀察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存在某種內部斷裂。簡言之，努力進行公共書寫的學界同仁，往往也是對自我殖民這個議題比較有敏感度的人，從不參與公共書寫的同仁，反而可能在這個議題上敏感度較低。我個人的粗略觀察，也許有待嚴謹的研究來驗證，但是若我的觀察並沒有背離事實太遠，這個現象也就顯示了公共書寫在消解自我殖民上的意義。若是我們必須要對公眾說明我們在做什麼，以及我們所從事的研究活動的意義，那麼它就不可能是西方經驗或是西方概念的簡單移植。轉譯既存在學術與非學術作品之間，也存在於全球意義下的英語學術社群與非英語學術社群之間。

近年許多學者的公共書寫其實不再以臺灣民眾作為對象。學界同仁在國際媒體上的投書或是評論，所在多有。相關作品也包括在 *Washington Post* 的政治學專欄 *Monkey Cage* 上刊出對臺灣政治現象的分析，雖然投稿的臺灣學者旅居國外，但是這個趨勢是臺灣公共書寫的延伸與擴大。在國際場域中對臺灣經驗的公共書寫，毫無疑問增加了臺灣的能見度，也賦予公共書寫更為寬廣的意義。

無論是科普學術研究或是針對時事進行評論，無論是面向臺灣公眾或是面對國際社區，公共書寫的定義、形式與範圍，都將持續隨著「公共」與「書寫」的變動而變動。也許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唯一能夠不變的是書寫的初衷。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而言，這個初衷，總有著對人的處境的關切。